

全球汉语教学新趋势

Teaching Chinese in
the World:
Cross-Cultural Approaches

对外汉语教学的跨文化视角

——旧金山对外汉语教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对比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

——兼论对比研究的三个时期、三个目标和三个层面

潘文国，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电子邮箱：wgpan@hanyu.ecnu.edu.cn

二十余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汉语与英语以及其他语言间的对比研究在中国十分引人注目。仅以汉英对比研究为例,根据我们最近作的一项调查(潘文国,2002)截至2001年6月在国内各种书籍杂志上发表的英汉对比论文为1468篇,其中1977年以后为1447篇,占论文总数的98.6%。出版的英汉对比专著和论文集为92部,其中1977年以后为82部,占著作总数的93%。之所以要以1977年为界,倒不是因为政治上“文化大革命”正好结束、学术研究得以开展的原因,而是因为在那一年,中国最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到北京语言学院(现在的北京语言大学)作了一个《通过对比研究语法》的学术报告(吕叔湘,1977),从而揭开了新时期如火如荼的对比研究的序幕。1977年后论著数量的急速增长,有许多原因,有“文革”后学术繁荣的整体大气候,有改革开放政策对涉外学科的兴趣的提高,但更重要的是,它适应了新时期迅速发展的一些应用学科,如翻译学与第二语言教学的需要,成为其发展的基础理论和有力支柱。

吕叔湘先生的报告还有另一层意义。这篇对比研究进军号性质的讲话最初是在以对外汉语教学为主要任务的北京语言学院作的,说明吕先生特别重视对比研究对于对外汉语教学的意义。事实上,1977年以后的对比研究工作,最初确实是首先在对外汉语界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的,以后才发展到了理论语言学界和英语教学界。但

90 年代以后，重心渐渐移到了英语界，对外汉语界从事研究的人反而少起来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

对外汉语界对于对比研究的忽视来源于某些过时的错误信息。由于对外汉语界真正能阅读外语文献、跟踪国外理论最新进展的人不多，许多信息来自于翻译的著作或国内学者用汉语写的理论著作。如果人们较早接受的是过时的或不准确的信息，由于先人为主的原因，可能会对以后的研究取向产生较长远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有两本书对于对外汉语界的影响较大。一本是原作出版于 1973 年、而译作出版于 1983 年的 Pit Corder 的《应用语言学导论》，一本是对外汉语学术界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出版于 1990 年的盛炎的《语言教学原理》。这两本书都对“对比分析”采取了批评态度而且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应用语言学在语言教学中的运用经过了“对比分析”到“偏误分析”再到“中介语理论”这样三个阶段而“对比分析”处在最原始的第一阶段，在教学中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样的结论，如果放在 80 年代末之前不能算是什么错误，但 80 年代之后随着国内外对比研究的新进展（国外如 Carl James 出版于 1980 年的名著《对比分析》和 Tomasz P. Krzeszowski 的《对比语言学的范围》等国内则自 1992 年以后出版了好几本令人耳目一新的对比研究专著）再持这样的观点就未免给人落伍的感觉。

要理解对比分析到底有没有用，要从对比研究的历史说起。许多文章谈到对比研究的历史，都是轻描淡写说一下 Whorf 最早提出了“对比语言学”的名称，然后就说对比研究实际是从 Fries 和 Lado 开始、到六七十年代达到高潮，然后就开始走下坡路。这样一种叙述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对比研究，如果不算没有理论意识、只是在实际教学和翻译中不自觉地进行的朦胧阶段（这一阶段在西方，Krzeszowski 上溯到公元 1000 年前后 Aelfric 所著的 *Grammatica*，其中对比了英语和拉丁语语法，见 Krzeszowski 1990:1 而在中国，则可追溯到公元 5 世纪前后的佛经翻译，如道安谈到的“胡语”与“此土”文字的区别，见道安 1984）在近代至少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

一个时期从 19 世纪的洪堡特开始 到 20 世纪初欧洲的叶斯柏森和美国的沃尔夫 他们奠定了对比研究的哲学基础、方法论基础和理论目标,这就是语言世界观、从内到外即从意义到形式的语言研究方式,以及探索民族语言和民族精神的关系。第二个时期从 Fries 和 Lado 开始、到六七十年代主要在东欧活跃的一些研究,其特点是以美国结构主义作为其哲学和方法论基础,并且以第二语言教学为唯一指归。这一个时期的研究 由于其基础理论 结构主义 的局限,从总体上来说是不成功的,往往流于浅层的比附。这是对比研究遭致后人批评的主要原因。第三个时期从 1980 年 Carl James 的书出版开始,一直到现在。有意思的是 从 James 到 Krzeszowski 对比研究的发展似乎是“逆向”的 从对第二时期研究目标和结果的不满 渐渐走向对第一时期在理论追求上的回归 而在为教学、翻译等服务的实际应用上,也突破了第二时期寻找对应关系或等值关系的表层研究。一般文章中关于对比研究的历史叙述只提到第二时期,甚至认为对比研究就这些内容,难免会得出不合实际的结论。

第三时期的对比研究与第二时期不同 从中国 90 年代以后的研究中也看得出来。我曾经提出 国内的汉英对比研究从 90 年代以来有八大趋势。这就是:(1)学科的自觉意识越来越强;(2)学科的理论意识越来越强烈;(3)从微观走向宏观;(4)微观研究的深入化;(5)积极引进和运用国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6)理论与方法的多元化;(7)对研究者知识结构的关注;(8)汉语主体意识的觉醒(潘文国 2002:71—83)。这一形势与 80 年代初与西方第二时期相类似的“比附研究”的局面不可同日而语。其中“从微观走向宏观”与 James 做的事相似,理论的自觉意识和追求与 Krzeszowski 相似 而“对研究者知识结构的关注”和“汉语主体意识的觉醒”则表明中国的对比研究者在某种程度上已超越了国外的同行,更注重追求早期对比学者洪堡特、叶斯柏森、沃尔夫等人所设定的目标。

这一超越还表现在国内学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关于“对比研究的三个层面”的理论 第一个层面是表层结构形式的对比 第二个层

面是表达法的对比，第三个层面是语言心理和思维方式的对比。这个思想最早是刘宓庆 1991 提出来的，后来得到了国内几乎整个汉英对比学界的赞同。如果采用叶斯柏森的话，第一个层面相当于他说的‘从 O 到 I’的研究，第二个层面相当于他说的‘从 I 到 O’的研究，而第三个层面则是他说的“更深刻地理解人类语言和人类思维的最内在的本质”(Jespersen, 1929)。如果联系国外对比研究实践来说，第一个层面相当于第二个时期的研究，第二个层面相当于 Carl James 等人的研究，而第三个层面则是回归到了洪堡特和沃尔夫等人。因此国内的学者（如潘文国, 1995）鲜明地提出对比研究的哲学基础是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

这三个层面在分别独立进行的时候，各自有其特别关注的服务对象或者说目标。例如国外第二时期的对比关注的是语言教学，Carl James 关注的是语际翻译，洪堡特关注的是人类语言与思维间的关系的探讨。对比研究的历史表明，前两个层面的任务都无法脱离第三个层面独立完成。因为语言间的差异，不管是表层结构上的，还是中层表现法上的，最终都须从深层语言心理或民族思维方式上得到解释，国外第二时期对比研究的最终被抛弃，表明单纯的结构对比对语言教学并无多大帮助，而 James 等人主张的语篇对比等，也无法最终解决翻译中的一些根本问题。因此，中国对比语言学界的主导思想倾向于认为，对比研究要采用宏观指导下的微观研究的方法，宏观微观并重、理论与实践并重，要在对语言本质妥善理解的基础上解释表层和中层的差异。

从这个理解出发，我们对语言对比研究与第二语言教学例如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的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本来，对比研究天生就是为教学与翻译服务的，可以说，自从有了外语教学和翻译，人们就在那里从事自觉不自觉的对比。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要是我们不帮着学习者去比较，他自己会无意之中在那儿比较，而只见其同不见其异，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比附了。”（吕叔湘, 1947）国外第二时期对比研究的无效不能说明对比研究对第二语言教学没有用处，而只能说

明理论和方法的不足，因之而放弃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开展对比研究就是一种因噎废食的见解。我们认为，对外汉语教学界应该发扬吕叔湘先生开创的传统，加强语言对比研究。根据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的具体任务、对象和目标，这一研究可以在三个层面上进行。

第一个层面仍是语法和语音的表层。其目的是为初学者提供一根学习的拐杖。表层对比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更无法预测学习者所有的困难，但不能反过来就认为它对所有问题都不能解决。所有困难都无法预见。即使能解决部分问题，预见部分困难，对于学习者来说也是有益的。何况如果我们能将对比研究与偏误分析、中介语分析相结合，可以预见和解决的比例有可能更大。表层对比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它不会触动母语和目的语现行的语法体系，防止学习者思想出现混乱。

第二个层面是语言表达法的层面，在国外更多地表现为语篇和语用的对比研究以及对“交际能力”的强调。这是对索绪尔的“语言”的突破，从而进入了“言语”，即语言实际使用的层面。对于第二语言学习，包括语际翻译的实用价值更大。在具体操作上，这一对比可以以共同的范畴如有定无定、肯定否定等作为出发点，其好处是可以突破现行教学语法体系的束缚，特别是像现行汉语语法那样的对实际语言缺乏解释力的语法体系。但是它对教学者和学习者的要求都会较高。一般是针对高级的学习者，帮助他们更地道地使用目的语语言。

第三个层面则是语言心理的对比。这是一种更深层的对比，目的是探索隐藏在语言的不同表达法后面的文化和心理背景，探索人类语言共同的本质和各民族语言特有的性质，更好地理解和使用语言。这一研究的理论性较强，并非是每个第二语言学习者甚至每个第二语言教师的任务。但这一研究的深入对于正确开展上两层对比有巨大的指导作用，对发展一个民族的语言科学也有极大的意义。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三个层面，我们还会发现，第一个层面的背景是结构语言学，第二个层面的背景是社会语言学，而第三个

层面的背景是认知语言学。这也正是 70 年代以后世界语言学发展走过的历程。对比语言研究要跟上世界语言学发展的步伐, 这也是一条必由的途径。

如果我们再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我们还会发现, 第一层面的对比是用自然科方法学的方法去研究语言, 第二个层面是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去研究语言, 而第三个层面是用人文科学的方法去研究语言。这也体现了语言研究发展的大趋势。

参考文献

- [1] 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密经钞序》 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4。
- [2] 科德, S·皮特:《应用语言学导论》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
- [3] 刘宓庆:《汉英对比研究的理论问题》(上下)载《外国语》,1991(4)(5)。
- [4] 吕叔湘:《中国人学英文》,1962 年再版 改名《中国人学英语》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47。
- [5] 吕叔湘:《通过对比研究语法》 载《语言教学与研究》试刊,1977(2)。
- [6] 潘文国:《语言对比研究的哲学基础》 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5)。
- [7] 潘文国:《汉英对比研究一百年》 载《世界汉语教学》,2002(1)。
- [8] 盛炎:《语言教学原理》 重庆出版社,1990。
- [9] Corder, S. Pit, *Introducing Applied Linguistics*, London: Penguin Group, 1973.
- [10] James, Carl, *Contrastive Analysis*, Harlow, Essex: Longman Group Ltd., 1980.
- [11] Jespersen, Otto, *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29.
- [12] Krzeszowski, Tomasz P, *Contrasting Languages: The Scope of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0.

学习策略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 (CSL 学习的影响)*

吴勇毅，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电子邮箱：wuyongyi@hanyu.ecnu.edu.cn

—

综观近些年的对外汉语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趋势：一是开始注意到了从对外汉语的角度研究汉语本体与以往汉语本体研究的不同，“研究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自然不同于研究作为母语的汉语。我们认为，研究服务于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问题也就是研究‘教什么’的问题”，‘教什么’是汉语本体研究的中心应该特别注意研究‘彼无我有’或‘彼有我无’的语言现象”（赵金铭，2001）以及“彼此似是而非”的语言现象。这方面大家特别关注的是对外汉语教学参考语法的研究，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尤其是侧重用法的、带有对比性质的对外汉语教学参考语法。可喜的是这项研究已由北京语言大学的对外汉语研究中心立成大项目，开始着手攻坚。在本体研究方面还有基于外国人中介语语料库的汉语句法语义语用研究和汉语韵律特征与洋腔洋调的研究。

二是我们注意到最近几年介绍、讨论所谓这种那种教学法的文章相对少了，而研究汉语作为第二语言(CSL)习得的文章开始多了

* 本研究得到了国家汉办(NOCFL)“十五”科研规划的资助。

起来。究其原因,可能有二:(1)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为大家对“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学原则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尽管具体怎么结合各有各的做法)教学法趋于综合,现在整个第二语言教学界也强调各种教学方法的融合和各种教学原则的综合”(刘珣,2002)。(2)实际上在我看来是从教的角度去探索追求所谓“最佳教学方法”的失败。这话说得也许有些过头和偏激,但至少可以认为,我们从教的角度(怎么教)所做的努力受阻停滞陷入困境了。我们尝试过很多教的途径,改进教学方法,但未见得对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有特别大的帮助(这也许就是“传统法”为什么总是“打”而不倒“的缘故之一”(吴勇毅,2002)。于是,一方面受到国外第二语言教学理论研究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实际教学和研究的迫切需要(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的研究重心也由原来的“教”转到了“学”,“时钟”的摆动是因为“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到研究外语学习主体、外语习得具体过程、外语教学环境,对真正认识外语习得的本质从而更好地组织外语教学活动是多么重要。”(戴炜栋、束定芳,1994)“在‘学’和‘教’这对矛盾中只有基本弄清了学生习得过程、习得顺序、习得规律、习得策略之后,才能真正谈得上有针对性地实施教学。否则,‘怎么教’的研究就会发飘、欠缺依据、底气不足,依然摆脱不掉经验之谈的毛病。”(赵金铭,2001)

这种“重心转移”这种认识上的变化比国外的第二语言教学理论研究晚了许多,但总的趋势和目标是一样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对学习的主体、学习主体的习得过程以及影响习得过程的其他因素一无所知或所知甚少,又怎么能找到所谓的“最佳教学方法”呢?我们必须在只考虑教的“教学法”和基于学的“教学法”之间作出选择或平衡。

目前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中,有两个主要的方向:一个是研究某个或某些语言项目的具体习得过程和习得顺序及讨论研究方法(孙得坤,1993;赵立江,1996;王建勤,1996;钱旭菁,1997;施家炜,1998、2000、2001;江新,1999;王韞佳,2002;刘蕾,2002;袁博

平,2002);第二个是分析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认知心理过程及其和语言能力获得的关系等(徐子亮,2000、2001 吴勇毅,2001b;李晓琪,2001 鹿士义,2001)。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策略(learning strategies)的研究主要属于后者,但与前者也相关(采用何种方式、策略习得语言项目、对语言项目习得的影响)。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都为数有限,但前景却非常看好,十分诱人。

二

国外第二语言学习策略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 Rubin(1975)的 *What the 'good language learner' can teach us?* (《成功的语言学习者可以教给我们什么?》)为代表。对语言学习策略的定义各家有各家之说(参见文秋芳,2000)。我国外语教学界,主要是英语教学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为有效学习所采取的措施。该定义强调了两点:使用策略的目的在于提高学习效率;策略的实质是学习者的行动而不是想法,该行动可以是外部活动,也可以是内部活动。”(文秋芳,2000)(2)“指学生在发展第二语言或外语技能中,促使学习进步而使用的具体的行为、步骤或技巧,它被认为可以促进第二语言或外语的内化、存贮、提取或使用。”(秦晓晴,1996)对外汉语教学界基本上采用了后者或与后者相近的说法(徐子亮,2000 江新,2000 吴勇毅,2001a)。“通俗点说,学习策略就是学习者用来促进学习,使学习更加迅速有效的方法或者行为。”(江新,2000)

通常认为,学习策略的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成功的语言学习者所使用的学习策略调查,包括在习得听说读写各种技能时所使用的策略;成功的语言学习者与不善学习语言者在学习策略使用上的差异对比分析,有人认为学习策略有好坏之分,但也有人认为策略本身无所谓好坏,关键是使用的时机、阶段是否得当,各种学习策略的确认和分/归类,学习策略的使用与学习效果之间的关系,即学习策略有效性的研究,是不是所有的学习策略都能使语言学习者获得

良好的学习效果，学习策略使用的种类与频率与学习效果之间的相关性；影响策略使用的诸因素，尤其是学习者本身的心理认知因素；学习策略能否培训，培训的方式及培训对第二语言学习的有效性研究等。

我国外语教学界，主要是英语教学界（其他语种非常少见或几乎不见）关于学习策略的研究始于 80 年代初。“与国外的研究相比起步不能算晚，但成果数量不多且研究涉及的面不够广。”（文秋芳，2000）与我国的外语教学界相比，对外汉语教学界开始研究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策略要晚得多，可以说从 90 年代末才刚刚开始。如果以杨翼（1998）的“高级汉语学习者的学习策略与学习效果的关系”算起，迄今不过五年，成果自然更加少。目前第二语言学习策略的研究已成为第二语言习得，乃至应用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策略的研究则仍是一块亟待开垦的土地。

下表是我国外语教学（主要是英语教学）界与对外汉语教学界关于学习策略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成果对照。我国外语教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仅仅于此，笔者只是撷取其中一部分大家公认比较有代表性的（发表在国外的一些成果可参见文秋芳，2000）。

外 语 教 学 界

对 外 汉 语 教 学 界

研究内容	文章及作者名	研究内容	文章及作者名
学习策略调查与影响策略使用的相关因素分析	吴一安、刘润清等 (1993) 中国英语本科生素质调查报告 文秋芳 (1996) : 大学生英语学习策略变化的趋势及其特点 文秋芳、王海啸 (1996) : 大学生英语学习观念与策略的分析 傅政 (2001) : 二语学习成功者策略研究初探	学习策略调查与影响策略使用的相关因素分析	江新 (2000) :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策略初探 徐子亮 (2000) : 外国学生汉语学习策略的认知心理分析 江新、赵果 (2001) : 初级阶段外国留学生汉字学习策略的调查研究

(续表)

研究内容	文章及作者名	研究内容	文章及作者名
成功的语言学习者与不善学习语言者在学习策略使用上的差异对比分析	文秋芳(1995):英语学习成功者与不成功者在方法上的差异 马广惠(1997):高分组与低分组学生在学习策略上的差异 郑树棠等(1997):关于大学英语课中学习策略的研究 刘亦春(2002):学习成功者与不成功者使用英语阅读策略差异的研究		
学习策略使用与学习效果之间的关系	蒋祖康(1994):学习策略与听力的关系 文秋芳(1996):传统和非传统学习方法与英语成绩的关系 文秋芳、王海啸(1996)学习者因素与大学英语四级考成绩的关系	学习策略使用与学习效果之间的关系	杨翼(1998)高级汉语学习者的学习策略与学习效果的关系 赵果、江新(2002):什么样的汉字学习策略最有效?
词汇学习策略研究	王文宇(1998):观念、策略与英语词汇记忆 吴霞、王蔷(1998):非英语专业本科生词汇学习策略	阅读中学习策略的使用 写作中学习策略的使用	刘颂洳(2001):关于在语境中猜测词义的调查 吴平(1999):从学习策略到对外汉语写作教学
		外国学生汉语学习与中国学生英语学习的学习策略对比	徐子亮(2002):两种不同的第二语言习得中的学习策略分析

抛开研究成果的数量问题不谈,通过对比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几个问题:(1)一些经典性的研究我们对外汉语教学界没有做,比如,成功的语言学习者与不善学习语言者在学习策略使用上的差异对比分析(个案或群体);(2)在研究方法上,大家基本上都采用问卷调查(问卷设计和调查内容各不相同)、测量试卷或考试卷、面谈/访谈、观察(人工或人工加摄像,如拍下被试在阅读文章时的情景或课堂表现)、自省/自陈、记日记和教学笔记等。所用的统计工具大都是 SPSS(Statistical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但我国外语教学界调查研究的规模(如被试的人数)远远超过对外汉语教学界,因而在概括性、代表性和解释力方面更能说明问题,更有说服力。(3)由于国外对第二语言学习策略,尤其是 ESL 的学习策略已有很多而且相当系统的研究(国外对于 CSL 的学习策略研究极少)因而我国外语教学界的研究主要在于印证对比国外的研究成果并进而发现中国学生在英语学习策略使用方面的特殊性,研究的范围和领域比较广。而对外汉语教学界由于起步晚,成果少,研究的范围和领域有限,尚不能全面系统地归纳整理出外国人汉语学习时所使用的学习策略。(4)在对外汉语教学界仅有的几项研究中,有两项是比较特殊的。一项是关于汉字学习策略调查及其有效性的研究(江新、赵果,2001、2002)。这是由文字(汉字)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江新、赵果(2001)在区分认知策略(cognitive strategies)和元认知策略(metacognitive strategies)的基础上编制了汉字学习策略量表,并对学生(汉字圈/非汉字圈)进行了调查,发现在认知策略中,学生最常使用的是字形策略、音义策略、笔画策略和复习策略,其次是应用策略,最不常用的是归纳策略;汉字圈学生比非汉字圈学生更多使用音义策略、应用策略,更少使用字形策略、复习策略。在元认知策略方面,监控策略(汉字圈学生和'非汉字圈'学生的使用频度没有显著差异,但计划策略前者比后者更加常用。在研究了汉字学习策略与汉字学习效果的相关关系后,她们得出结论:应用策略是提高汉字成绩的有效策略,形声字学习效果比非形声字学习效果对策略更敏感,字形策略

不利于汉字学习。她们的最后一个结论是与我们许多汉语教师，尤其是一些西方国家汉语教师的做法相左的。记得十多年前，笔者第一次听一位西方国家的教授讲汉字教学法，其中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学生想象单个汉字的“图像”或“画像”。如把“羊”想象成有两只角的羊的正面头像或有头角足尾的整只羊侧面像，把“龟”（龜）想象成前头中壳后尾，更“形象”的是把“电”（電）想象成中间是个电匣子，一横是开关，当中是一根电线穿过。还有的教师把类似的方法写成文章。汉字像图画是不少西方学生对汉字的认识，教师把汉字的象形性加以利用，当作某种策略吸引学生学习汉字也未尝不可，但让学生把它当作学习策略来使用就值得商榷了。

另一项是关于外国学生汉语学习与中国学生英语学习的学习策略对比研究（徐子亮，2002），目的是想找出外国学生汉语学习与中国学生英语学习在学习策略上的共性和特性，以及这些共性和特性的认知心理机制。这种研究未见我国外语教学界做过。这种对比研究对我们真正了解教学对象的特质非常有意义。

我自己对比了三项关于“记忆策略”使用的研究（英语两项、汉语一项）结果很有意思。王文宇（1998）在关于英语词汇记忆的调查中发现，中国学生在“学习观念上”对“单词要不要背”这个问题的回答普遍是肯定，而且“非常赞同‘背单词’”。这与一些西方学者不鼓励背单词，主张通过广泛阅读自然习得单词的观点相悖。但在“学习策略”的使用上，“重复策略”（机械记忆方法）与“编码策略”（联想、词形分析、上下文）的使用频率几乎相等，后者还略高一点。“这表明背单词时，学生并不拘泥于一种方法，而是多种方法兼收并用，下苦功也下巧功。”吴霞、王蔷（1998）调查了中国学生对三种英语学习观点的态度：（1）学习词汇应该死记硬背，（2）应该在上下文中学习，（3）应该通过运用来学习。结果显示：“三种观点中，最不受欢迎的是通过死记硬背来记单词，相反在上下文中记单词和通过运用来记单词这两种策略较为普遍接受。”学生的观念如此，但在实际实习中，“统计结果表明学生并不普遍接受死记硬背的观点，而认知策略中具体的

死记硬背策略却仍然被广泛运用。由此可见，一方面多数学生接受了词汇学习不能靠死记硬背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们事实上还在无意识地运用策略。他们的研究使我感兴趣的有两点，一是‘学习观念’和‘学习策略’并不总是统一的，可能出现‘说归说，做归做’的情况；二是中国传统的学习观念“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和学习方法不仅根深蒂固而且‘迁移’到了中国学生的外语学习中，同时西方的学习观念和学习策略也正在影响着中国学生的学习，同传统进行较量。江新（2000）在调查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策略时发现留学生“最不常用的策略是记忆策略和情感策略”。“留学生很少使用记忆策略，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适当的记忆方法的重要性，或者对各种帮助记忆的方法不了解，没有接受过记忆术方面的训练。”我认为不是学生不知道记忆的方法，因为记忆策略不是语言学习所特有的，更深层的原因也许是西方学生受西方学习理念的影响，同时把学习其他语言（如德国人学英语，法国人学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的策略“迁移”到学习汉语和汉字上来了。对比这三项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在学习观念和学习策略上的差异，也能引起我们更深一步的思考：目的语和学习者不同，在语言学习策略的培训上是否也应有别？

三

外国学生在学习汉语时策略使用不当时有发生，举例来说，我给
学生听的材料《中级水平》中有这样几段话：

(1a) 男：哎，你看，这么薄的一本书竟标价 13 元！看书的人真的买不起书了。

女：是啊，我差不多有大半年没买一本书了。

(1b) 男：你看你，为小朋的婚事急得头发都白了不少，何苦呢？

女：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换个个儿试试？

(2) 女：大学生活怎么样？一定是丰富多彩的吧？

男：什么呀，我们每天不外乎“宿舍—教室—食堂”三点一线。

(3) 丈夫：做一盘蛋炒饭好吧。

妻子：（没好气地说）什么叫蛋炒饭？应该叫饭炒蛋！你说饭多还是蛋多？

丈夫：好了好了，就算是饭炒蛋吧。半夜三更的，那么大的嗓门儿干什么？

在听 (1a) 时“你看”学生理解时没有问题，但 (1b) 中的“你看你”学生虽然听得很清楚，也可以写下来，可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同样“什么呀”、“好了好了”也是如此。大部分学生，尤其是日本学生和韩国学生，为了知道这三个“东西”的意思，都拼命地翻查词典，希望能从“看”、“什么”、“好”这三个词的义项中得到解释，可词典里就是没有。还有些学生听的时候，对这些词语干脆忽略不“记”，他们并没有去注意这几个词语在上下文中的“功能”是什么，因此很难体会说话人的感觉和意图，并对话语做出正确的理解。显然学生采用了不适当的策略和方法。我告诉学生“你看你”表示“责怪、埋怨”（如：“你看你，这么点小事都办不成，让我说什么好呢？”）；“什么呀”表示“不同意或反对对方的意见”（如：“——她是我们学校最漂亮的。——什么呀，比她漂亮的多的是。”）；“好了好了”表示“妥协、息事宁人或劝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好了好了，你们俩别吵了。”）这些“功能”是在语言的使用中表现出来的，词典里一般查不到，只能在交际中，在上下文中去理解把握，并有意识地在实践中运用。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策略的研究非常重要，对我们的教学将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一领域的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界才刚起步，还有许许多多“空白”需要填写。为此，我和我的课题组提出了“外国人汉语学习策略的调查与研究及对外汉语教学法的改革”的研究课题，申请作为国家汉办（NOCFL）“十五”科研规划的重点项目，现已得到批准及资助。

我们的课题将从调查分析欧美、日本、韩国等不同国家学生学习